

# 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

陳廣恩\*

《廣東文徵》是清末民初吳道鎔、張學華編輯、增補的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乃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廣東文徵》常為學界引用，但對這部嶺南文獻及作者本身的研究則非常薄弱。本文對吳道鎔、張學華以及《廣東文徵》的編纂、流傳情況做一較為完整的考察。

嶺南地處中國南海之濱，不但地理條件與中原殊異，而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語言、人情、風俗、物產等都帶有濃鬱的地方色彩，從而孕育了獨具特色的嶺南文化。自唐以來，記載嶺南文化的著作比比皆是。其中全面收集嶺南文獻、文物、金石、著述等相關作品，彙編成大型文獻的做法，也是保存嶺南文化的一種方式。自明張邦翼輯《嶺南文獻》首創此例後，屈大均《廣東文選》、溫汝能《粵東文海》、羅學鵬《廣東文獻》、陳在謙《嶺南文鈔》、吳道鎔《廣東文徵》（以下簡稱《文徵》）等，均為此類文獻之傑出代表。在現存上述廣東文獻中，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當屬《文徵》。《文徵》在嶺南文獻中的重要性，潮陽劉侯武曾指出：“《嶺南文獻》，邦翼創此規模；《湖南文徵》，滌生綜以情性；《粵東文海》，遂壯波瀾；《嶺南文鈔》，轉嫌釘釘。從未有牢籠百代，戢彞群言，考作者之生平，體符別傳，志文章之目錄，旁證方輿，如吾粵番禺玉臣吳道鎔先生《廣東文徵》之輯也。”<sup>(1)</sup>而《文徵》的輯錄、增補、整理，乃至保存和流傳，則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

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後，有不少清朝遺民來到澳門做寓公。他們在澳門創辦了“蓮峰陶社”，定期相聚，互相酬唱，表達遺民的孤獨和憤懣，如張學華

的〈奉訊貽覺公澳居〉一詩，就頗能表達旅澳清遺民之心態：

年年漂泊感風塵，猶喜音書問訊頻。  
赤手更無撐柱望，白頭同作亂離人。  
歲寒松菊荒三徑，世外桃花各一律。  
曾是鐵橋遊憩地，好將姓氏訪遺民。

這些遺民往往為清朝政要，其中不乏才學之士，如汪兆鏞、吳道鎔、張學華、汪兆銓、利樹宗等等。他們在感歎“風流文采無人問，搔首夕陽感慨多”（汪兆鏞詩句）之際，又不甘淪落自棄，遂致力於詩文創作或嶺南文獻的整理編纂工作。正因如此，澳門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對嶺南文獻的整理和流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徵》的輯錄者和增補者吳道鎔和張學華，都曾在澳門生活過，《文徵》書稿也曾被帶到澳門，澳門對於《文徵》而言，起到了整理編纂和保存的重要作用。

《文徵》流傳至今，已有改編本面世。改編本於20世紀70年代曾在海內外發行過一千套，此舉實乃學界之幸事，也為學人使用這部珍貴的嶺南文獻提供了莫大方便。但仍有相關機構和學者對此不甚瞭解，甚至認為《文徵》可能已經失傳。如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8月（此時距改編本出版已近

\*陳廣恩，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元史、西夏史及嶺南地方文獻研究。

兩年)在影印出版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輯所收吳道鎔〈澹齋文存〉(與《廣東藏書記事詩》合為一冊)的出版簡介中說:“至於用力最為勤劬,歷時二十年,以至病篤猶在輯補,包羅嘉慶以還,作者七百餘家,文章三千餘篇之巨著《廣東文徵》,反隱沒而不彰,殊屬憾事。就張學華所撰〈行狀〉云:原稿未刊,吳氏謝世,迄今三十餘年,中經抗戰、‘剿匪’兩大亂,此作是否仍在人間,實未可知。此真嶺南文獻莫大之損失。”不僅如此,目前海內外學界關於吳道鎔、張學華以及《文徵》的專題研究,也是寥寥無幾。據筆者統計,大概有陳潔所撰約二千字文〈吳道鎔與廣東文徵〉<sup>(2)</sup>,以及關國煊所撰人物小傳〈吳道鎔〉、〈張學華〉等。<sup>(3)</sup>因此,有必要對吳道鎔、張學華以及《文徵》的編纂、流傳情況做一番較為完整的考察。

## 一

《文徵》的輯錄者是清末民初吳道鎔,增補者是同時代人張學華。吳道鎔(1852-1936),原名國鎮,字玉臣,號用晦,晚號澹庵,廣東番禺人。其先浙江會稽人,業隄於粵,遂家番禺。少時曾就學於應元書院,深為著名學者順德李文田所器重。十七歲,補縣學生,中光緒乙亥(光緒元年,1875年)恩科舉人。李文田敦促赴試,光緒六年,登進士,入翰林,假歸省親,丁外艱,十二年服闋入京,散館授編修,與李文田共事南書房。但吳道鎔為人澹泊名利,厭倦仕途,李文田就曾有“不以祿仕相勸”之語。<sup>(4)</sup>吳氏遂辭官歸故里,以講學終其身,先後任潮州韓山書院、金山書院、惠州豐湖書院、三水肄江書院、廣州應元書院講席。與陳石樵、石惺庵於郡學設“陳石吳館”,從學者數百人。又任學海堂山長。光緒二十年,粵督岑春煊改兩廣大學堂為廣東高等學堂,吳道鎔受聘為監督(相當於校長),任職八年,為廣東造就不少人材,汪兆鏞、汪兆銓等即出其門下。辛亥革命後,“謝絕一切。(……)閉戶著述,翛然絕俗。”吳道鎔一生以文化教育事業為己任,獎掖後學,延接後進,晚年曾獲賜匾額曰“行為士表”、“劭德引年”,死後獲賜“抱璞懷貞”。<sup>(5)</sup>

吳道鎔為學博綜經史,旁及算術及泰西政學,諸書無所不覽。所著有《澹庵詩存》一卷、《澹庵文存》二卷、《明史樂府》八卷、《海陽縣誌》四十六卷、《廣東文徵作者考》十二卷、《番禺縣續誌》四十四卷。早年還撰有《公羊質疑》,惜書未成。其書法成就也頗受時人推崇。初期學柳,晚年改習隋碑,所書“屈翁山墓碑”幾與隋蕭飭性夫人墓誌無異,而榜書“保滋堂”三字尤佳。晚年以賣字為活,“求者接踵”<sup>(6)</sup>。嘗有廣州賭商喪妻,以二千元為壽,請為點主,但卻被吳道鎔拒絕。受其影響,吳氏側室符澹人亦擅長書法,做做吳道鎔之體,幾可亂真,被冒廣生比作黃石齋、蔡夫人伉儷。<sup>(7)</sup>

吳氏工詩,尤擅古文。他有感於東塾先生陳澧言粵東多詩人而少文人,遂發憤學習古文。其為文導源於史漢而涵詠於諸子,每有所作,精心獨造,思沉而氣銳,力矯浮靡。“所為文字,不絕俗以表異,而言必衷諸道,未嘗遷就已意以徇人”,於“經史掌故之學,均能洞見本原”。<sup>(8)</sup>他認為文之至者,當妙合於自然,如果着力求之,終非極詣。因此,其門人汪宗准所撰〈澹齋文存跋〉云:“發為文章,深微澹遠,足與桐城、陽湖諸家並美。”<sup>(9)</sup>

吳道鎔因專攻古文,遂博考粵東作者。鑒於屈大均《廣東文選》、溫汝能《粵東文海》傳本日少,惟故家間有收藏,且《粵東文海》儘管有六十六卷,搜羅略備,“然漢唐宋元僅三十家,明一百八十餘家,清五十餘家,罅漏固不少也”。<sup>(10)</sup>於是遂以《粵東文海》為祖本,將其全部逐錄,並於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間粵人遺著悉力甄錄,“餘如《嶺南文獻》、《廣東文選》、《廣東文獻》、《嶺南文鈔》、《潮州耆舊集》、《高涼耆舊集》、《端溪文述》、《學海堂集》,以及諸家撰著,省郡邑志,靡不從事採掇”。<sup>(11)</sup>吳氏“以勝朝遺逸,野史耆儒,稽掌故於楚庭,出心裁於珊網,時乎蛾術,具此鴻編。自炎漢之初興,逮滿珠之末葉,綜二千年之文筆,舉七百家之姓名”<sup>(12)</sup>,歷時二十年,悉力甄錄,辛勤採輯,“病中猶校補弗輟”<sup>(13)</sup>,選錄自漢至清粵人六百零六家,最終輯錄成稿共十六類二百四十卷,名曰“廣東文徵”。“此二百冊卷之

巨帙，一十六類之文裁。庾嶺北來，瓊臺南盡，棉疆梅嶠，代產英賢。發而為事功，蘊之為德行。或立言而不朽，或餘力以學文，煥發千春，楷模多士。”<sup>(14)</sup>可見，《文徵》不僅是吳氏生平精力之所萃、粵東文獻之巨帙，而且也是“吾粵數千年名公巨儒精神之所寄也”<sup>(15)</sup>，對保存嶺南文獻具有重大意義。“吾粵二千年文化賴以不墜，尤為藝林盛事。”<sup>(16)</sup>吳氏配合所錄《文徵》又撰《廣東文徵作者考》，敘作者里貫、仕履、事蹟，凡十二冊。但天不假年，吳道鎔於1936年病逝，其書稿也未能最終寫定。

吳道鎔死後，由其門人將原稿交予吳道鎔的姻親張學華重加修訂。張學華遂與汪兆鏞、溫肅、桂坵共同整理，其中張學華用力最勤。張學華是吳道鎔的兒女親家，但二人的關係則比姻親更為密切，溫肅稱其二人為“肺腑交也”。<sup>(17)</sup>張學華在吳道鎔門人陳善伯等整理的《澹齋文存》後，題有如下四首詩，從中我們也能體會到張學華對吳道鎔的推崇和二人之間深厚的感情：

早歲辭榮晚致身，力扶名教有完人。  
要將家國無窮恨，寫入詩篇泣鬼神。

一代詩家面目存，但憑格調莫輕論。  
谷音自有錚錚響，不落風塵體獨尊。

故國平居感念深，瓊樓高處自沉吟。  
靈均發憤成天問，想見斯人鐵石心。

東華回首尚依依，海外同遊又一時。  
今日淒涼悲宿草，淚痕和墨點君詩。<sup>(18)</sup>

張學華（1863-1951），初名鴻傑，後改學華，字漢三，號閩齋，廣東番禺人。原籍江蘇丹徒。其父乃清誥贈榮祿大夫張樸臣，張學華為張樸臣第三子。學華五歲喪父，其母陳氏“艱苦守節，以養以教”，延師教授，後受贈一品夫人。<sup>(19)</sup>在母親的辛勤養育和教導下，張學華於光緒十六年考中進士，改翰林院庶起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國史館協修

等，清亡前一直在清廷做官。辛亥革命後遷往香港，也是一位頗有愛國熱忱的遺老。他長於詩文、書法。1923年印行《粵海潮音集》。1927年編《京江張氏家集》成。1941年香港淪陷後，日寇企圖圖色在香港嶺南大學任教的嶺南才女洗玉清與張學華兩人牽頭，組織香港東亞文化協會，以為日寇統治香港服務，但為二人堅決拒絕。洗玉清為此還寫下了“國愁千疊一身遙，肯被黃花笑折腰”的詩句。張氏後赴澳門，新中國建立後返回廣州。著有《閩齋文稿》、《采薇百詠》等。

張學華對《文徵》多有增補。1939年，客居澳門、時年七十七歲的張學華，寫下了〈廣東文徵舊記〉。在這篇記文中，他談到《文徵》的增補情況：“蓋網羅散佚，每有所得，隨時加入。歲月迭積，卷帙遂增。”<sup>(20)</sup>經張學華增補後的《文徵》，“所錄自漢至元，凡八十二家，明三百家，清三百二十家，釋道各五人”<sup>(21)</sup>，合計共錄粵人七百一十二家，文章三千多篇，約三百多萬字，比吳道鎔的原稿增益不少。1941年，張學華在澳門又撰成〈《廣東文徵作者考》序〉，據此我們可知《廣東文徵作者考》的增補情況：“遺稿未及寫定，余為之整理。續得百數十人，以次編入，合七百一十二家，較《文海》所增逾倍，遂錄成帙。（……）茲冊倣《八旂文經》例，所選文目錄附列傳後，尤便瀏覽。唯諸家考略或見於志乘，或採自傳記，傳聞互異，間有脫誤。余與汪君憬吾（汪兆鏞）往復討論，務求詳覈。桂君南屏（桂坵）、溫君毅夫（溫肅），皆有所考正。時閱數年，書經數手，編校甫竣。”<sup>(22)</sup>張學華補錄《文徵》之際，正值抗戰期間，張氏輾轉遷徙於港澳之間，晨鈔夕纂，孜孜不倦，精心呵護，才使得這部珍貴文獻得以保存下來。大約在1941年之前，吳道鎔的門人陳伯任、陳善伯曾手錄書稿副本，亟謀付印；孫淑資則捐資刊刻《廣東文徵作者考》，以期流傳。

抗戰勝利後，張學華攜帶書稿返回廣州，而此時他已年過八十。張氏感念年事已高，世事無常，而《文徵》乃粵東文獻之巨帙，又是姻兄畢生心血之所繫，編纂實屬不易，一旦毀壞或散佚，不但其姻兄及諸友之心血付諸東流，而且粵東文獻之巨帙亦

將不存。於是他將《文徵》的底稿寄存在廣東著名藏書家徐紹榮（字信符）的南州書樓中<sup>(23)</sup>，以期有刊刻之日。1947年，邑人葉恭綽（字裕甫，號遐庵，晚年別署矩園）返粵後，與張學華、徐紹榮相協商，邀同北京圖書館、香港孔教學院、廣東省文獻委員會、香港大學圖書館、東莞明倫堂、馮秉芬、莫伯驥（字天一）、高可寧等集資，以機械謄寫九份，分存各地，以防意外，而原稿仍存放於南州書樓。謄寫本被稱為藍曬本，釐為八十一卷，分訂為二十七冊（見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目）。凡出資者各得一部。遺憾的是，徐紹榮已於1948年逝世，未見其成。因《文徵》終未能刊刻，張學華也年將大耋，於是他又將書稿從南州書樓取回，交予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保存，以垂久遠，用心可謂良苦。其後香港珠海書院請人將原書用毛筆分鈔為八十一卷六厚冊，影印出版，以廣流傳。<sup>(24)</sup>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建校十週年。為志中文大學十週年紀念之盛，由劉侯武發起，陳式欽捐資刊印《文徵》。這次刊印以吳氏原稿和張氏增補稿為基礎對《文徵》做了改編，改編工作由李棧負責。李棧（1910-1996），字勁庵，號棧齋，李文田之孫，專攻南明史，兼習甲骨文，六七十年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李棧將《文徵》改編為精裝六巨冊，當時印行一千套，以“保存文獻，嘉惠士林”。<sup>(25)</sup>《文徵》改編本的最終出版，可謂了卻了幾代人的心願，對此陳式欽感慨道：“片羽吉光，書林瑰寶，矧茲巨帙，猶幸保全。《文徵》舊稿，迭經兵燹，四十年間，善守勿失，而編者、校者、增補者、謄錄者、藏有者，其功誠不可沒。今獲睹全書，壽諸梨棗，嘉惠來學，使嶺海文化賴以不墜，豈僅當前藝林之佳事，亦累代賢哲之遺光。”<sup>(26)</sup>

改編後的《文徵》仍按時代順序以人分卷，每卷若干人。各人後先附小傳，後依原稿體裁依次排列所選文章。改編本全書做了斷句（無校），便於閱讀，從而極大地方便了學界的使用。但美中不足的是，改編本斷句問題很多<sup>(27)</sup>，訛、脫、倒、衍的現象很普遍，因此難免造成理解上的歧義甚至錯誤，

這自然會影響到這部珍貴文獻的使用價值。鑒於此，筆者曾將改編本的斷句問題歸納為十一類，另撰文提出具體商榷意見，以期盡可能正確理解原文文義，提高這部文獻的利用價值。

## 二

吳道鎔編纂《文徵》的初衷，他在〈與姚君愨書〉中有交待。他說：

昔黃梨洲序《明文案》，標舉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元遺山，元之牧庵（姚燧）、道園（虞集）七家，謂以成就名家而論，則有明一代如七家者，無其一人；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七家之文。竊嘗持此意，推論吾粵數千年來古文名家，雖不多覯，然既稱一代作者，亦必有門庭，否則一節一章，亦必有至情孤露之處，其他因人因事當存之以資考證者，尚不在此例。而吾粵文總集，若張氏《文獻》、屈氏《文選》、溫氏《文海》三書，流傳日稀，幾成孤本，且應選之文，亦多遺漏。溫氏以後，如馮氏（奉初）《潮州耆舊集》、吳氏（宣崇）《高涼耆舊集》、陳氏（在謙）《嶺南文鈔》，皆就聞見，偏舉一隅，無續纂成大部者。竊不自量，欲匯而集之，復取方志及諸家之集，滌其繁蕪，加以摭摭，為《廣東文徵》一書。從事累歲，粗具規模，尚未寫定。<sup>(28)</sup>

在吳道鎔編纂《文徵》之前，已有不少學者編輯過嶺南文獻。明代張邦翼輯錄《嶺南文獻》，是現存最早的粵人詩文總集，全書共三十二卷，選錄自唐開元至明萬曆年間共三百零五家粵人作品，在嶺南文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其書編纂工作歷時一年即成，所以清人王之正斥其為“荒穢不擇近於濫”。<sup>(29)</sup>不僅如此，屈大均還認為《嶺南文獻》“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蓋因文而求其獻耳，非因獻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選》之體乎？以言乎文獻，則非矣。”<sup>(30)</sup>並且書名為“嶺南”亦不得當。鑒於此，屈大均遂“博取而約之，撰為一書，名之曰《廣東文集》，使天下人得見嶺海之盛於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

以與《廣東通志》相表裡，豈非一國人文之大觀乎哉！”<sup>(31)</sup>《廣東文集》共收錄從漢至清初二百餘家，人為一集，集分諸體，按人分卷，共三百卷。因《廣東文集》卷帙浩繁，故屈大均又從中選錄了一些作品，輯成《廣東文選》四十卷另行。應當說，《廣東文集》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廣東文獻，但遺憾的是並未正式刊刻，因此未能流傳下來，這不能不說是嶺南文獻之一大損失。《嶺南文獻》和《廣東文選》的輯錄特點，除了選錄粵人之文外，還輯錄部分粵人的詩詞，其中《嶺南文獻》輯錄有七卷，《廣東文選》有十五卷，這與其後《粵東文海》、《文徵》等粵文總集的選錄體裁有所不同。《粵東文海》儘管有六十六卷，選錄粵人作品較《嶺南文獻》和《廣東文選》要多得多，但也祇錄有二百六十餘家，且流傳日稀，並遺漏了很多“應選之文”。其後羅學鵬編輯的《廣東文獻》有四集七十一卷，收錄六十二家詩文，陳在謙輯《國朝嶺南文鈔》十八卷，阮元等輯錄《學海堂集》四集共九十卷，陳澧編《菊坡精舍集》二十卷，所錄粵人及其詩文，或限於篇幅，或“偏舉一隅”，均“無續纂成大部者”。鑒於此，張學華在為《文徵》所作的序中，指出了補輯粵文而成《文徵》的三條理由：

夫前人文字，磨滅未盡，時時晚出，或得之碑碣，或採之志乘，吉光片羽，彌覺可貴，此應補輯者一也；溫氏斷自乾隆朝，嘉道而後，作者踵起，近如《嶺南文鈔》、《端溪文述》，採錄無多，至各家有專集行世者，尤宜以時蒐集，此應補輯者二也；《文獻》、《文選》、《文海》流傳日久，寔成孤本，海內故家間有收藏，亦如麟角鳳毛，不易得見，此應補輯者三也。<sup>(32)</sup>

正是針對上述粵人（詩）文集編纂以及流傳中存者的缺點和不足，吳道鎔才耗費二十年心血輯錄成嶺南文獻之巨秩。是故，《文徵》無論是編纂規模還是品質，應該都超越了前集，而毋庸置疑的是，《文徵》較前集則保留了更多的嶺南文獻，尤其是已經散佚了先賢文章。對此，張學華評價說：“唯前人專集，大

半失傳，片羽偶留，訪求匪易，闕遺之憾，固未能免。而累年蒐集，鄉邦耆獻，略具茲編。”<sup>(33)</sup>

吳道鎔編纂《文徵》的體例，很大程度上是模倣了湘潭羅汝懷《湖南文徵》的體例。他認為《湖南文徵》的編纂體例最為得當（詳下文所引《文徵》“略例”），所以據此將《文徵》全書分體編輯為十六大類：一、敕、制、誥、命；二、上書、表、啟、狀；三、奏疏；四、策議；五、書；六、論辯、考說；七、序；八、題跋；九、記；十、碑；十一、墓碑、表志；十二、傳狀；十三、祭文、誄；十四、賦；十五、箴、銘、頌、贊；十六、雜文。堪稱各種文體俱備，駢偶兼錄，惟不錄律賦（倣《唐文粹》例）和詩詞（倣《粵東文海》例）。其實，《文徵》的編纂體例是吳道鎔在綜合了諸如羅汝懷《湖南文徵》、楊慎《全蜀藝文志》、姚鉉《唐文粹》、張邦翼《嶺南文獻》、屈大均《廣東文選》、溫汝能《粵東文海》、陳在謙《嶺南文鈔》、盛昱《八旗文經》、吳訥《文章辨體》等諸家（詩）文總集的基礎上，兼取眾長而最終確定的。

吳道鎔在《與姚君愨書》中，不但交待了其編纂《文徵》的初衷，而且還在信末附有“《廣東文徵》略例”，這是研究《文徵》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惜尚未引起學界重視。“略例”一共十條，舉凡吳氏著書大旨、編纂體例、徵文標準、取捨依據，以及選錄文章作者小傳之撰寫等，均有說明，這對我們瞭解《文徵》的編纂及徵文情況非常有用，對研究《文徵》的價值自不待言。故此，茲錄“略例”如下，加以點校，以方便學界使用：

一、是編擬名為《廣東文徵》，大旨以發明經史、敷陳政術、考見風俗、能說山川、可備掌故數者為主，尚實而不尚虛。凡空衍靡曼之文，皆不列入。但徵文與選文微別：選文則或以義法，或以格律，別擇必嚴；惟徵文則因文考獻，別有取義。故或有義法稍疏、瑕瑜不掩者，亦不免過而存之。

一、省郡文章總集，或以人而分，或以體而分，各有不同，如《廣東文獻》、《江右古文選》、《東甌先正文略》<sup>(34)</sup>，皆以人為次第。惟

《湖南文徵》則分體編錄，而分體之中，其人又順時代而分次序，較為適要。是編擬用其法。

一、乾嘉以前志乘，於藝文多載詩文。古人一鱗片甲，往往而有其為益於闕文者良多。惟其中所錄，率皆山水、祠廟、廡舍、津梁紀事之作，或寓於燕雜，未能悉中度程，則不得不從遺棄，各家稿草視此。

一、登錄多寡，本無成見。楊昇庵《全蜀藝文志》則謂，諸家全集，如陸與蘇盛行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鑒》例也。茲做其意，名家巨集，流傳眾口，略採精華，足見宗尚。至若才豐遇嗇，聲采銷沈，舊帙雖梓，已經散落，亟為甄錄，以闡幽光。

一、《湖南文徵》選例云：“累牘連篇，文之盛也；單詞片語，豈謂非文？其不以文著而以詩見者，則徵諸題下之小引；不以文著而以書稱者，則徵諸帖中之跋尾。縱波瀾之未沛，亦掌故之聊存。”茲擬做之，凡詩家之小引、書家之題跋，亦可節錄。

一、文家每輕視駢偶，然駢散兼行，各有摘用，即韓、歐大家集中，亦並存不廢。是編擬二體分錄，偶體即附散體各類之後。

一、詞賦一類，亦列編中。然古賦、律賦，體實區分。姚鉉《唐文粹》一書選古賦而遺律賦，茲擬採其例，律賦概從割棄。

一、作者不詳事蹟，無以論世知人。唐〔姚〕合<sup>(35)</sup>編《極元集》，於名字、爵里及登科之年，一一詳載，從來編集之有小傳，實做於此。其最為詳贍者，則元遺山《中州集》、王漁洋《感舊集》，尤多遺聞軼事。《湖南文徵》變通之，編中文以類分，小傳別為部帙，正文略紀里貫、仕履，其事蹟之已見前載者附錄於後，用存遺事，其例頗善。茲擬做之，於編後別為小傳，參考志乘、傳狀，摘要書之。集中叙跋之屬，足徵生平學行，以及師友贈答、名人紀述，皆所酌採。

一、盛伯熙《八旗文經》於本編之後，別編《作者考》，其例與《湖南文徵》同。惟《文經》於叙述里貫之後，並列入選之文若干，編載於編中某卷，於調查良便。茲擬兼師其意。

一、其人已往，乃可論定。編中採列，不及時賢，此從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先例，生存一概不錄，以避棄取之嫌。<sup>(36)</sup>

## 【註】

- (1) (12) (14) 劉侯武：〈初刊廣東文徵改編本序〉，載吳道鎔原稿、張學華增補、李棣改編、《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校刊《廣東文徵》，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1973年，頁3。
- (2) 載《藝林叢錄》第四編，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64年版。
- (3) 分別載《傳記文學》第三七、四七卷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後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民國人物小傳》一、二兩輯。
- (4) (5) (6) (13) 張學華：〈誥授通奉大夫翰林院編修吳君行狀〉，載汪兆鏞輯《碑傳集三編》卷四〇，臺灣海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三輯。
- (7) 陳潔：〈吳道鎔與廣東文徵〉，《藝林叢錄》第四編，頁303。
- (8) 溫肅：〈澹齋文存序〉，載吳道鎔《澹齋文存》卷首，民國三十一年汪宗准等排印本。
- (9) 汪宗准：〈澹齋文存跋〉，載《澹齋文存》卷末。
- (10) (11) (32) (33) 張學華：〈廣東文徵舊序〉，《廣東文徵》頁8；頁7。
- (15) (16) (20) (21) (22) 張學華：〈廣東文徵作者考序〉，《廣東文徵》，頁11；頁12；頁7；頁8；頁11。
- (17) 溫肅：〈澹齋文存序〉。
- (18) 詩附《澹齋文存》末。
- (19) 孫葆田：〈旌表節孝張母陳太夫人墓表〉，載汪兆鏞《碑傳集三編》卷四七。
- (23) 徐紹榮〈自題南州書樓〉云：“翰墨生涯作蠹魚，北山斜對好安居。門雖近市何嫌俗，且擁琳琅萬卷書。”載《廣東藏書紀事詩》。
- (24) 關國煊：〈吳道鎔〉，載《傳記文學》第37卷（1980年第5期）《民國人物小傳》，頁147。
- (25) 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叢書第一集序〉，《廣東文徵》，頁1。
- (26) 陳式欽：〈廣東文徵改編本序言〉，《廣東文徵》，頁5。
- (27)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點校者理解上的問題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原稿副本誤字漏句極多，有的地方甚至脫漏數百字，而點校時未加校勘。誠如葉恭綽在《廣東文徵》的跋文中所說：“他日付印時，尚宜逐加校訂，以成完璧。”《廣東文徵》（改編本）第一冊“凡例”中亦指出：“蓋原稿手抄本已有不少錯漏；及謄錄時，復經眾手，故誤漏尤多。溫汝能《粵東文海》為吳氏所據之祖本，惜海外未有收藏；否則取之校勘，易收事半功倍之效。今次付印，雖曾點校一過，其中有明知其缺漏者，以無原本可稽，暫仍其舊。”
- (28) 《澹齋文存》卷一。
- (29) 王之正：〈廣東詩粹序〉，載梁善長《廣東詩粹》卷首，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十二年達朝堂刻本。
- (30) (31) 屈大均：〈廣東文集·序〉，《廣東新語》卷十一《文語》“廣東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17；頁316-317。
- (34) 東甌先正文略，當為“東甌先正文錄”之誤。《東甌先正文錄》乃清陳遇春所輯，有道光十四年梧竹山房刻本。陳氏所輯還有《栝蒼先正文錄》等。
- (35) 姚合，原作“元合”，當誤。姚合乃唐代詩人，元和間進士，世稱“姚武功”，其詩派稱“武功體”。曾取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編為《極玄集》（清避諱改為《極元集》），另著有《姚少監詩集》、《詩例》等。
- (36) 《澹齋文存》卷一〈與姚君愨書〉。